

党建视角

以『小』目标促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 吉琳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从从严治党的大势所趋，也是必然要求，绝非一蹴而就，必将经过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实践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每名党员、每个党组织，制定相应的“小”目标，通过每个“小”目标的实现，循序渐进，汇聚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大”目标。

学有“课程表”。实现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必须针对“学”字从两个层面给予课程安排，科学设定学分，修满学分方能参与评先评优。一是从组织层面排定“必修课”。党组织要通过“三会一课”“党员统一活动日”等契机，制定学习计划，排定学习目录，并“挂图作战”，以组织认可的档案目录倒逼学习计划的完成，完成一课，归档一课，计分之一课。二是从党员层面设计“选修课”。党员也要借助新媒体、书籍、报刊等载体，排定“自学课程表”，完成一课，上墙一课，直至修满全年课程，并将其作为民主评议党员和评先评优的重要标准之一。

做有“课代表”。“课代表”指的是各行各业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是全体党员的表率，对激发党员先锋意识有着标杆作用。每个党组织都应该有选树“课代表”的职责，每名党员也都应该有追赶“课代表”的意识。一是要以党员集聚方式为主要依据，定量定级选树“优秀共产党员”。党组织应该具备慧眼，选好“课代表”，上墙、上网、上屏幕，为党员们定好目标。二是要从身边的目标中确定自己的“小”目标，以量化的形式，选择比学赶超对象。每名党员都应该有自己的“小”目标，这个目标不仅要写在纸上，更要刻在心里，在党内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改有“显微镜”。在整改的过程中会形成“清单”，这个清单不仅要自己清楚，支部清楚，更要扩大到群众清楚，特别是自己的服务对象，社会和群众应该是党员整改的“显微镜”和“动力源”。一是“整改清单”要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形成社会监督，倒逼整改落实。问题整改循序渐进，以时间为节点，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小”目标，改完一个，勾画一个，有效期内一标记，保证“不赖账”“不欠账”。二是“整改清单”要避免重复。杜绝“老调重弹”“老生常谈”，避免出现把老问题包装一下当新问题继续查摆的现象。在还清旧账的基础上，更要算清新账，以查摆问题促进精益求精，在差距中找不足，在不足处找突破，在突破中找到更好的自己。

管有“度量尺”。管理靠制度，执行靠考核。在管的层面上要注重建立长效机制、完善考评制度确保“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这里涉及三个层面的“小”目标。一是“一把手”的“小”目标，“主业意识”是度量尺。“一把手”的主业意识体现在对“学”的高度重视和对“做”的亲力亲为。比如“我是党课主讲人”的授课数，“书记项目”的实施推进，都应该成为“一把手”的“小”目标。二是党组织的“小”目标，考评制度是度量尺。突出正确的考评导向，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考评内容，纳入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纳入民主评议党员内容，加大“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考评比重。三是党员的“小”目标，社会评价是度量尺。党员在社会的公认度是党员创先争优的根本依据。民主评议党员应该放到更大的平台上，让群众和服务对象来评议，使评议结果更加客观公正。

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

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是延安时期党组织和党员在处理党内矛盾、调整党内关系、健全党内生活过程中表现出的好作风、好做法、好习惯、好制度的总称。主要包括：坚持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严明党的纪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正确选用干部等内容，构成党内政治生活的核心原则、基本目标、根本保证、有效手段和组织基础。

□ 郭建明

坚持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延安时期，我们党对民主集中制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建立了规范民主集中制运行的具体制度，确立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核心原则。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阐述了“党内生活民主化”的任务，强调指出“扩大党内民主”是巩固和发展党的必要步骤。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制度、保障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开好民主讨论会和座谈会、营造党内平等和民主讨论的环境等。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违反党内民主原则的个人专断和家长作风以及违反党内集中统一原则的分散主义和极端民主化，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所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把民主和集中对立或割裂开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党内民主、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的深刻论述，表明我们党已经从组织规律层面认识民主集中制。1945年党的七大明确提出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经典表述，表明民主集中制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理论形态。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

织机构的决定》。这些决定对民主集中制做出了具体的制度安排，涵盖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党的组织机构和代表大会制度、党内生活制度等方面，使民主集中制逐步具体化制度化。党的七大明确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安排——选举制、报告制、服从制、执行制，使民主集中制初步具备了完整的制度形态。在解放战争中，中央健全常委会制度，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形态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

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

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全党在经历了长征途中粉碎张国焘分裂党的斗争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重要性，明确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目标。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工作方针中指出：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我们有一条方针，就是团结，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首先是党中央内部的团结及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其次是党的上下组织、新老党员、新老干部、领导机关内部及武装部队的团结。七大党章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

延安时期党中央从维护党的团结出发，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正确处理西北中央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由“运盐”产生的矛盾，统一了对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认识。1942年9月，为了协调

边区党政关系，李维汉担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同李维汉长谈，强调指出：边区的工作，“第一要讲团结”，全边区要团结在西北局周围，政府内部要团结在党组周围。

严明党的纪律

党的纪律是提高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的根本保证。延安时期党所处的艰苦环境和各种挑战，更加突出地要求全体党员严格遵守纪律，为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提供了根本保证。

毛泽东说我们是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毛泽东特别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陈云当时也强调，遵守纪律是党员和党组织的最高责任。正是依靠严明的纪律，我们党才赢得优势，赢得人心，使陕甘宁边区呈现出党风正、军纪严、干群和的感人景象，建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

黄克功事件是延安时期严明党的纪律的典型案例。1937年10月5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向陕北公学女青年刘茜求婚不成，一怒之下枪杀刘茜。案件发生后，许多老红军鉴于黄克功战功卓著，主张用责罚代替枪毙。毛泽东在致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中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

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最终边区高等法院合议庭议决判处黄克功死刑。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党内矛盾和斗争是经常发生和普遍存在的。“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延安时期，我们党在反思历史上历次“左”、右倾错误的基础上，总结出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方法，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形成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有效手段。

首先，客观理性地对待批评。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其次，正确开展批评。要本着对同志负责的原则，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注重实效地进行批评，反对取消党内积极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反对破坏党内团结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善于进行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部分。”

延安时期党的领袖们带头进行自我批评，展现出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榜样力量。比如张闻天在党的七大上作自我检讨发言，认为内战时

期的错误源于“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自我批评的小资产阶级作风”，“对于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我是主要负责者之一，我是应该完全负责的，特别在发挥教条主义，反机会主义的思想斗争及后期苏维埃工作方面”。

正确选用干部

党员干部构成党内政治生活的主体，正确选用干部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为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提供坚实组织基础。

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是我们党选用干部的一个重要原则。延安整风中，毛泽东突出强调，要坚决反对宗派主义，在用人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小圈子。领导干部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团结的人越多越好。

在正确干部原则指引下，延安时期我们党以广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广开进贤之路，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根据地的事业中来，有效地推动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开展。

当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需要借鉴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结合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实践，在观念行为方面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在法规制度方面进行创新性发展。

以史为鉴

“民生在勤，性习于俭”的董必武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这是“延安五老”之一董必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立下的座右铭，如今刻在了湖北省红安县的董必武纪念馆。他以此自勉自励，也严格要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坚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

□ 王达阳

用钱要记账

抗战期间，董必武在国统区工作，经常教育工作人员：我们共产党人要讲革命不要讲闹气。他总是穿着最常见的长袍马褂，戴着最便宜的礼帽，脚蹬最普通的皮鞋，闹街过府，在敌人的龙潭虎穴中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5年，董必武参加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董必武有一笔可观的置装费和生活费，但他不仅手过千金分文不沾，而且还“克扣”自己的费用，在个人生活上精打细算，把省下来的钱捐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当时发给他的置装费是1300美元，他到美国后请同志帮忙选购物，要求不要选太贵的衣服，最终在成衣店买了一套25美元的西装，穿着这简朴而合身的服装出席联合国大会，省下了1275美元的置装费。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他也十分节俭，不住豪华宾馆，从不到大餐馆用餐，还经常自己做饭，最终省下了1260美元的生活费和200美元的交际费，这些省下的费用都被董必武用来贴补购买《新华日报》急

需的印刷机、英文打字机和出版英文版《解放前实录》等，全部用在了革命事业上。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曾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代主席等领导职务，但地位越高、荣誉越大，董必武越戒奢从俭，不仅拒绝额外的特殊照顾，连正常给予的待遇也力求简化。每天早起后，他泡上一杯普通的西湖龙井，一天之内只能续水、不加茶叶。他爱用牙签，但是用过以后总舍不得丢，总要拿来蒸一蒸之后再利用，直到用烂为止。牙刷也是一样，用到毛都卷了也不换，断了以后放在火上烤一烤，粘上继续使用。用纸方面也如此，董必武自己说：“我在用纸上是富有的，也是最穷的”。他常写东西，所以用纸多，是富有的；可是他一张小纸片也舍不得浪费，很多作品都是写在旧台历纸、晚会节目单、废旧请柬上的，而且正反面都写上字，所以自嘲是最“穷”的。

他对孩子也一样，一分钱、一粒米都不能浪费。女儿董良翟现在还记得父亲教她“粒粒皆辛苦”的事。当时她还小，三两口扒完饭丢碗就要跑，父亲叫住她，说：碗里、桌上有多少饭粒？“粒粒皆辛

苦”，粒粒不能丢！父亲严肃地要求她：把米粒捡起来吃了。她感慨说：当时真嫌它脏，不想吃。后来经历了生活，去了干校劳动，才明白父亲的苦心。

平时生活中，董必武要求孩子们用钱必须记账，他对子女们说：要用你们用钱记账，不单是怕你们多花钱，而是要胸中有数。这样做，养成习惯，将来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要用钱的时候，就会从实际出发。

绝不能要求特殊照顾

董必武在党内地位和声望很高，但是他从不通过个人关系办私事，也教育子女绝对不能以他的名义要求特殊照顾、享受特权。

新中国成立后，有的亲戚看到董必武在北京做了“大官”，就希望他在私事上“关照关照”。董必武对亲戚们那些不合理的要求，一概坚决拒绝，并说：即使是合理的要求，也不要从他这里打主意，应该通过自己所在单位的正常途径申请解决。他给亲友们写了一封“通函”，告诉他们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

对身边工作人员董必武要求很严，他有个著名的“约法三章”：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不许接受礼物。每逢新同志到他身边工作，他都会当面申明这三条规矩，严肃地说：谁违反了我就送去公安局。

在董必武的严格教育下，他的三个子女小时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不吃零食，做事待人讲究老实本分，从不提父亲是“董必武”，从不摆架子，儿子董良羽自嘲是“想摆也摆不起来”。儿子董良翻高中毕业后，董必武要求他：

“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翻还是下乡插队去”，就把他送到了河北省的偏僻农村插队落户。董良翻在农村十分努力肯干，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生产队的党支部要发展他入党，董必武得知后坚决反对，他说：你才下乡两年，时间还太短，再过一段时间，再看看，严肃考察考察再说。又过了两年，董良翻凭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当上了大队干部，董必武又特地叮嘱他：你是革命的后代，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

在工作中，董必武要求：妻子和孩子们不能进他和秘书的办公室。有事情可以在门口招呼他，离放文件的小茶几隔着一两米远，他就先把文件对折露出全白的纸面。工作上的事情他从来不说，也不要孩子们随便打听讨论。董良翟回忆说：父亲和我之间有着这种默契，父亲从来不把不应该让我知道的事情告诉我，也从来不在我们在场的情况下谈论工作上的事。我们也从来不去打听任何国家机密。

学要有恒，尤要专心

读书学习对有的人来说不是一种规矩，但在董必武这里却是言传身教、实实在在的董氏规矩。

董必武是前清秀才，满腹诗书，后来参加革命也从不忘读书，甚至在长征路上，他都随身背着书，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写到哪儿。新中国成立后，工作之余，董必武总是手不释卷。65岁了他还自学俄语，学习的精神令人十分感动。

董必武不仅自己孜孜不倦地学，而且还勉励子女亲属和所有晚辈们学，他还给身边工作人员定学习计划，圈定报刊上的好文章要求

他们学，定时检查他们的学习效果。

董必武对自己孩子的学习要求很严，而且亲力亲为。他手把手地教孩子们练大字，说：“中国字是方形，要写得好就得掌握平、正、匀、熟的要领。”他还亲自给孩子们挑书，多次说过：“如果我死了，送你们兄妹三人各一套《资治通鉴》。”董良翟有段时间身体不好，休学在家，董必武就去书店里，蹲在书堆里上上下下地翻找，花了大半天，给女儿挑了一本叫《万象》的图案画册，供她学习参考。

“鼓足劲头持久战，青春不再莫蹉跎。”这是董必武写给董良羽的一首诗，教育他要珍惜时间，学贵有恒。他说“青年学生时代最大的毛病是不好学”，建议孩子们可以实践下父亲传给他们的学习方法：“学要有恒，尤要专心”。有一次，董良翟拿一道不懂的几何题问父亲，他思考了好久也没做出来，但是把解題思路写出来供女儿参考，然后要求她再想想；过两天谈话，又说起几何题，董必武叮嘱女儿要问问老师和同学，把题目弄懂。当天晚上女儿去他房间时，发现灯光下他半躺在床上已经累得睡着了，手里还捏着那张发黄的纸片，在思考那道几何题。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欢乐每相亲。”读书的乐趣与作用恐怕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最好的家风，一定是有读书传统的家风”，各人天赋不同，读了书不一定扬名立万、位居高官，但是一定是明理的、于社会有用的一分子。好读书、读好书，大抵算是董必武留给孩子们的宝贵私人遗产吧。

党史人物